



金融研究简报

第二十九期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2014 年 5 月 26 日

日本社会经济面临的总危机及其走向

——人大重阳思想沙龙第 19 期会议纪要

2014 年 5 月 20 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经过长期跟踪研究，推出主题为“日本社会经济危机与安倍经济学走向”的最新研究动态，并举办了第 19 期思想沙龙，邀请旅居日本 20 多年的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日本 JCC 新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庚欣主讲。庚欣指出，日本经济的长周期、结构性病症使安倍经济学难以真正生效；仅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很难在短时间内让日本经济取得根本性好转。针对日本能否重走军国主义道路、重返政治大国之列，以及其他发达国家是否面临与日本类似的危机等问题，在场嘉宾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安倍经济学，药不对症

庚欣（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日本JCC新日本研究所副所长）：

今天天气很热，但现在的情况是，天气再热中日关系也热不起来，而且总是感觉凉嗖嗖的。尽管还没有恶化到发动战争的地步，但实际上已经有了一些迹象，比如某部队海军司令员多次声称，“我们已经在擦枪，尽量做到不走火”。把握好中日关系大局，我觉得重点是关注日本经济或中日经贸关系。

一、怎么看待日本及日本经济？

日本首先是个经济大国。在发达国家中，像日本这样自然条件不好——岛国、面积小、自然灾害多、人口众多，战后政治环境差的国家，能够发展到现在这样不容易。目前，国内有舆论认为日本越来越朝着一个野心勃勃的政治大国迈进，甚至有可能走向军事大国。实际上，日本在二战后被迫离开政治大国的行列，现在它也认为自己有实力归队，所以入常（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修宪等要求都是它的夙愿。但现实情况是，日本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还比不上几个金砖国家。我认为，至少从战后到今后的五年或十年，日本还是仅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存在，因为该国的基本性格特征决定它回不了政治大国的队伍。正如日本自己所言，它在经济上是一流，政治和外交上却是三流。

日本经济发展对国际社会、中日关系的影响是正面或负面？我认为还是正面影响多一些。这应该是我们对日本经济和这个国家的基本定位，对于我们今天考虑中日经贸问题，处理中日之间的纠纷有帮助。

二、安倍经济学出师不利

安倍经济学的三个主要经济政策，即被安倍称为“三支箭”：第一支，

让日元贬值；第二支，增加公共投资；第三支，唤起民间投资和经济增长。但这“三只箭”均出师不利。从今年日本公布的财政数据来看，安倍经济学产生的效果不太理想，日本国民的实际感受也是这样。为何“出师不利”？

第一、投资不利。刺激日本经济的核心问题就是刺激投资。现在看来，投资的情况并不理想，虽然量化宽松、积极财政、刺激投资改革等政策实施后使得投资有所增长，但从日本投资银行 2013 年投资总调查结果来看，存在“四少”问题。

- 1) 投资总量有增长，非制造业、房地产投资比较多，但制造业比较少；
- 2) 制造业投资中维护补修方面投资比例比较多，新生的生产能力投资比较少；
- 3) 计划投资比较多，但实际投资少。
- 4) 海外投资少。相对国内投资可通过财政手段加以鼓励，日本海外投资少。去年是海外投资最低的一年，同时海外短期投资较多，长期投资比较少。

第二，量化宽松政策。在这一年真正见效比较多的还是量化宽松，即日元贬值政策。日元从 1985 年广场协议之后长期居高不下，这种升值倾向保持了近 30 年，是日本经济的基本特征。我们观察日本经济好多现象，应该从日元升值开始。

量化宽松政策让日元贬值幅度很大，贬了近 30%。但让人感到很意外的是，2013 年度日本经济贸易赤字创历史最高，大约 14 万亿日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日元贬值这么多，赤字没有缓解，反而增多了，原因在哪儿？我认为这也是我们认识安倍经济学和日本经济最重要的点。

1、出口未达预期。总体而言，日元长期居高不下，除了汽车这样的少数产品之外日货价格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即便日元贬值 30% 之后，日货在国际市场上总体价格仍然不具优势。

还有就是日本人常提到的“中国价格因素”。日本产品讲究高附加价值、高成本所以要高利润，就需要高价格打入国际市场来引领产品技术的

潮流，品牌的潮流。而类似中国产品的价格特征，在日本叫“合理价格”，就是特别低（但这个价格本身肯定有问题，国内成本估算体系有问题，比如我们的资源、劳动力、环境都有透支的一面，没有充分估算这个成本）。现在发展中国家多数都是所谓“合理价格”，这些产品一旦进入国际市场，只要它对日货在使用价值上具有可替代性，就必然对日货高质量高价格的产品造成冲击。现在日本企业都在研究怎么和中国产品的价格进行抗衡。

此外，2013 年是日本出口价格上涨幅度自 33 年来最大的一年。日元在贬值，出口价格却在上涨，因为日本企业对自己产品的附加价值、性能优势充分自信，觉得涨价也不愁销。这样的情况更导致了产品出口增加不足。

2、进口价格上浮。“3·11”海啸灾难使得核电站去年全部停摆，“反核”在日本已经是很大的社会问题。核电占日本电力总装机量的 30%，日本原本想拿核源作为今后主要的动力源，而现在这百分之三十几的动力源没有了，只能靠进口能源，日元的贬值加之进口的刚需，导致进口价格上浮。

3、产业链转移，国际分工改变。由于长期受日元高举的影响，日本大量产业已经转移到中国、东南亚等国，且目前已经没有了回流的可能。安倍经济学出台后，由于国际分工格局，其对刺激经济的影响有滞后性，并不能立竿见影解决问题。

三、安倍经济学，药不对症

第一是周期问题。日本的经济我们一般概括为起飞、高速发展、走向成熟、提高生活质量几个阶段。实际上日本十几年前就已经在讲提高生活质量的问题，我把日本的经济现象概括为经济饱和。这个“饱和”基本是消费饱和，由此带动生产经营，包括整个产业外移、国际分工定位、经济发展方式都出现了饱和现象。

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重振国内经济其实有相当大的难度，所以日本的病首先是周期性的，在长周期当中处于弱势的发展位置。

当然，周期里也有经济周期和社会政治周期相配套和相符的问题。从经济周期来看，东京奥运后再算 7 年，大约十多年的一个奥运周期，日本大概能产生 15 万个就业机会和 300 亿美元的经济效益，这对日本来说当然是很好的活力因素。恰好这个七年周期，也是安倍的修宪周期，他希望这十来年完成他修宪的雄图大志，这两个周期碰在一起就出现了摩擦，有很多不适应的情况。而从日本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的不相符合，也可以看出安倍经济学和政治的自相矛盾。

日本能否重返政治大国队伍？

胡昊（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主任）：日本的情况我比较关注，庾所长的论证还是很扎实。但我觉得用“总危机”这个词容易让人想到上世纪 30 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时苏联称“资本主义陷入总危机”即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机会到来，所以“总危机”这个词可能意识形态色彩太浓，表达同样的意思，用“全面危机”可能更好。

请教庾所长两个问题。第一，最近日本在右倾化的路上越走越远，尤其通过了核武器转移的三个原则，能看出日本想向军事、政治大国前进。日本军事、科技潜力非常大，高端武器方面的技术储备非常雄厚，在世界武器市场份额较大，其中在亚太占 20%、达到了 3690 多亿美元。如果日本军事生产能力解放出来的话，对日本经济摆脱危机有多大作用？

第二，有关俄日关系。年初索契奥运会的时候，安倍去俄罗斯想使日俄关系有所进展。没想到后来遇乌克兰危机，日本必须跟着西方七大国对俄罗斯统一进行制裁。日本内心不愿意，但又不得不服从集团的行动。请问您觉得西方制裁俄罗斯能走多远，下一步俄日关系进一步发展的着力点在哪儿？

金赢（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今天日本确实处于战略

决策的时期。日本自明治维新时代以来一直是处于两种文明或两种国家发展路线的抉择中，究竟是走大陆路线还是走海洋路线，可以说是一直困扰该国近代化以来的大问题。前不久奥巴马的东亚行、日本行，很明显地感觉到，最起码在安倍政权时代，日本在口头表述上还是强调海洋路线，但岛屿经济、海洋经济必须着陆才能有长远的发展，而今天日本处理不好和东北亚这些陆地国家的关系，它的经济目标、政治目标以及整个国家的战略都很难实现。

关于经济周期、社会周期、政治周期配套相符的问题，我认为，日本目前自发性政治周期产生的问题影响到了它的经济周期。解铃还须系铃人，如果政治上不能做出“政治决断”，那么这个国家就没有希望。此外，庚先生刚才讲到的安倍经济学中的两点，我很受启发。

一是投资问题。投资是经济复兴发展的源泉，日本政治方面的投资实际都不利于它的长期发展，可以说是危险的、饮鸩止渴式的。日本的军事经济发展可能在短期或中期对经济复苏有一个拉动作用，但对于日本未来的国家形象而言，实际是一剂毒药。

二是日本“贬值”。除了日元贬值，日本实际在政治理念定位上也在自我贬值。日本在战后的和平发展是全世界都非常认同的一种政治价值，但今天它通过集体自卫权解禁和修宪，是在自我贬值。这个自我贬值不只对周边发展不利，对它自己也是长期不利。

长期来看，中日关系不会有太大问题，最大的问题会出现在“短期”和“中期”，尤其是“短期”。鉴于安倍可能在今后几年都执政，中国是不是与日本继续保持政冷的关系更加理智？在战略上适度保持冷淡日本、保持距离，但不要交战这样的底线？这种短期的战略庚先生觉得是否合理？

庚欣：刚才金老师特别提到了日本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我正好有两个新的消息供大家来参考。

第一，5月17日的APEC贸易部长会议上，商务部长高虎城见到日本经济大臣茂木时说：“中国重视中日经贸关系，愿意继续稳定、巩固和发展这种关系”。这是安倍去年参拜靖国神社后的第一次中日部长级官员见面。19日《日本经济新闻》评论说认为中国已经开始重提政经分离的原则，而且要以经济为中心尝试打开中日关系的局面。

第二，4月15日汪洋副总理会见河野洋平。河野洋平带团来华。日方报道里提到，汪洋明确说“日本少数保守势力的言行和日中经贸关系，和日中民间往来要严格区分”。这句话在日本报纸普遍被引用，被认为是中国政府高级官员正式重提政治和经济分开这样的说法。我一直是比较赞成把政治和经济区分开来。

关于军事、经济的问题，我接触过的一位在日本搞军工比较权威的老人说过，时过境迁，已经不是当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的时代了，靠军工赚钱不可行，毕竟已经不是战争的年代。和平的时代，发展的时代，搞战争、搞革命都是失大于得。现在日本还做着七、八十年前的梦，寄希望于军事经济、政治上的保守化和经济上的复苏三者能相互促进，这是不可能的。从战略上我很同意金老师的意见，日本在军事上的所得和整个国家形象，日本国情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所受到的损失相比肯定是弊大于利。

张岸元（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财政金融室主任）：我想说三方面的感受。

第一，我高度认可庾所长关于日本国家定位和走向的基本判断。以我对日本有限的了解来看，所谓的“重返军国主义”等说法，应该说丧失了80%以上的经济、历史、社会、人口的基础。从战前的情况来看，日本人口的增长，城镇化进程，教育水平的提高，加上军部、参谋体系等因素是形成军国主义非常重要的原因。反观当代，无论是人口基础、行政化还是国家和民族对外扩张的愿望，日本都丧失了重返军国主义的条件。

第二，经济领域。对于日本这样巨大的经济体，试图通过量化宽松经

济政策的调整让经济恢复理想增长的想法是不现实的。财政货币政策的刺激可能在两三年内保持经济增长，但之后就不可避免地要进行重复调整。

就日本的经济活力而言，我认为根本原因还是缺少创新。和日本处于类似发展水平的经济体，他们摆脱短期危机最有效的手段是创新，而日本在这方面有缺陷，这可能与日本一些大财团、大企业主导的创新体系在某些不确定技术领域海量投入却没有得到回报有关，这使得日本的经济活力逐渐丧失。我认为，日本缺乏创新的经验教训对中国制定经济政策、规划产业发展战略时启示特别大。

第三，对日本未来走向的看法。我不认为日本经济未来还能够恢复到3%—5%的增长，高增长的时代对日本来说已经彻底结束了。日本未来不管是1亿人口还是8000万人口，能在岛国上过着高水平、安逸稳定的生活，这个前景是可以预见的。关于中日两国关系，日本未来几年在政治上会怎样发展、采取什么样的中日关系政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日本。

翟东升（中国人民大学对外战略研究中心秘书长）：我不认为日本已经进入危机，但可能是进入了长期下行的轨道。根据亚洲金融危机以及美国在2007年的情况，从前面的繁荣突然转向麻烦和绝境可以称之为“危机”，如果是看起来永无止境的下行趋势就谈不上是“危机”，危机应是断崖式的下跌。关于日本的未来，我认为经济增长上不会有明显的翻盘机会，可期望的是一个富足、安稳但日益老去的社会。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讲，安倍经济学的政策符合日本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和其他相关配套改革，而且都会形成对某一部分人的剥夺和另外一部分人的补贴。请问，安倍经济学是不是像华尔街所说的主要是剥夺老年人？我觉得有一定道理。

从年龄结构来看，安倍经济学是剥夺老年人、补贴年轻人。但从别的角度来看，比如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是剥夺谁补贴谁？在本国和外国之间

剥夺谁补贴谁？在消费者和投资者之间剥夺谁补贴谁？中国外管局把大量的国债放在日元上，但日元暴跌，从这一点上讲，安倍经济学相当于牺牲中国以及其他外汇储备投资国的利益来补贴本国产业。

日本的产业竞争力的确处于下行轨道上，比如从 90 年代开始国内产业过剩、外移，在重大技术改革路线上的一系列严重错误。这背后的根源是什么？是它的产业组织方式有问题？还是整个社会老化、没有了创造性？

庚欣：关于安倍经济学剥削谁补贴谁的问题，剥夺老年人的情况确实存在，老年人对加税政策怨气也很大，但是不是弥补了青年人这很难说。从产业链来说，我们和日本之间有竞争更有互补，所以中日经贸额还在直线上升。这就说明政治、经济不可分，但各有各的规律、有相对独立性，我们不能完全用政治眼光的判断来说明经济关系。

关于日本经济面临的诸多难题，其中经济长期饱和，缺乏经济增长点和新需求增长点是关键，根源是核心竞争力下降。缺失的创新性、封闭的民族性，以及国家目标的设定都使得该国失去了在五六十年代、经济发展蓬勃向上时所具有的旺盛的技术创新力。日本现在想把国内搞成高附加价值产品的研发中心，生产和销售两头放在海外。实际上，无论是它的政治环境和民族性都难以实现这样的布局，因为日本和美国的情况完全不同，众多外来高层次人能在美国找到自己的位置但在日本不容易。

日本面临的危机是发达国家的共同问题

马丁·李斯（人大重阳外籍高级研究员、前罗马俱乐部秘书长、前联合国助理秘书长、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创始成员）：

日本现在面临的危机，其他发达经济体是否也面临类似的问题？整个西方经济体系正在离开新自由主义框架为主导的时代，我们必须以这个框

架来看待日本现在的问题，中国也可以从新自由主义框架失败的角度来理解日本问题。在七八十年代，美国确信日本会超越他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所以当年美国认为日本人购买洛克菲勒中心是绝对正确的。但回顾历史会发现，日本人购买洛克菲勒中心后的第二年就出现了房地产泡沫，而政治因素是妨碍日本解决房地产泡沫问题的主要障碍。

日本人回顾过去的十几年，觉得他们失去了几个发展经济的机会。日本现在非常害怕整个世界政治权力结构的改变——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软弱——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喜欢安倍这样的领导人，因为他们需要安全感，以至于害怕战争的日本人也能接受安倍非常右翼的政治倾向。

过去几年里，日本经济增长需求大部分依赖中国的经济增长。日本虽然不是个创新的经济体，但它在各方面都有优势，比如技术能力比较强，劳工关系协调机制比较完善，而且在产品质量各方面都有绝对的优势。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可以把日本看成和德国、瑞典一样的高价格经济体，虽然高价格，但中国人享受它的高质量。

日本人为什么不像德国一样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最关键的还是日本社会老龄化和经济结构问题：一老龄化致使需求饱和，二排斥外来移民严重约束劳动力，三能源短缺。此外，我认为日本的福岛危机并没有结束，而且这个危机还会持续很长时间。所以，日本在未来必须创造出以创新为主体的新的经济结构。

庚欣：其他发达国家是不是面对类似的困境？我之所以用“总危机”的概念就是考虑到整个发达国家，而不是个别国家的现象。在经济领域里，发达国家面对旧的国际秩序和新的发展形势而产生的矛盾与不适应，包括从新自由主义走出来面临新的选择，这些我认为都是发达经济体整体要面对的难题，只不过各国面对的情况不太一样，日本遇到自然灾害的冲击更明显，政治因素的影响更多一点。

对于安倍，我认为日本老百姓和欧美发达国家都会支持他。他们并不

觉得安倍的右倾保守化有多严重，不认为这会改变日本以及东亚地区的格局，反而希望通过安倍政策让日本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变得更强大。5月中旬的民调显示，尽管人们对消费税上涨表示反感，但对安倍的支持率不降反升，因为日本需要这样比较强势的领导人。

贾晋京（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研究部主任）：

一、日本将来会怎么样？日本问题总的根源是人口结构问题，自然替代率是至少一对夫妇生 2.1 个孩子，日本生育率远远低于这个水平，将来也没有出现高生育率的契机和条件，只能看到人口规模不断萎缩。统计数据显示，日本所有制造业企业负责人的平均年龄超过 60 岁，年轻人又有大量宅男宅女。这是日本面临的问题。

二、日本将来的产业、工业会怎么样？日本所有制造业就业份额 91% 左右属于 299 人以下的企业。这几年它的制造企业总数大规模减少，2001 年还有 17 万家，现在只有 10.8 万家，减少最主要的原因是破产倒闭或关闭。小企业被大企业替代，大量企业产能转移到中国。这样的情况下，它的趋势可能不是一直平稳的衰落，而是到一定程度集中爆发的危机。

刘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从日本的产业结构性问题来看，我们能获得哪些经验？比如债务问题，日本有全球最大的、百分之两百多的债务率，这对我们现在的地方债问题有什么借鉴意义？日元国际化更多的是教训，这对人民币国际化有什么启示？还有金融体制改革的问题，我们在学美国，但从产业金融等各个角度来看我们更像日韩，包括日本银行以间接融资为主与我们相似，我国的金融改革形式如何借鉴日本的经验教训很关键。此外，我们的产业规划、出口导向和投资的拉动，这“三驾马车”都是和日本很相近。

补充一点，关于日本量化宽松政策，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本质是拉动实体经济的发展，但它面临一个问题，货币政策以邻为壑，比如

美国危机到来时肯定先想着自救，再考虑别的国家。中日是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我觉得他们特别倚重货币政策，我们国家的汽车业之前确实很小，但增速非常快，前两年几乎 50% 的产量，出口量最近两年危机时有所下降，吉利并购沃尔沃，我们一定会从数量的增长转变为质量的提高，不可避免会和日本企业进行竞争，他的量化宽松就是贬值，就是帮助他企业增强出口的竞争力，如果人民币保持不变的话，我们的竞争力就会下降。

庚欣：关于人口结构问题，除了人口自然结构的老龄化、少子化特征之外还有日本的社会文化基本维持了老幼的顺序，且直到今天都在继续强化。保守性、缺乏创新性对于日本发展的弊端是明显的，但对于社会稳定有利。日本人可能也深知自己的毛病，但他们在利弊相权衡之间，觉得现在这个格局对他们有利，尽管他们也在努力改造，但短期内可能还是要维持这样的局面。

所谓结构，主要是由于日本的岛屿经济、国情决定它一定是外向型的经济。岛国经济的特征需要人口、需要外来移民，需要背靠大陆发展。比如日本和中国东部地区保持良好互动就会促进经济发展。按理说，越困难应该越开放才能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但日本显得比以前更加保守、害怕开放，这和日本民族性格、民意流中的狭隘、不开放基因有关。长期和平稳定的生活也让日本社会产生保守倾向，致使短时间内改变国民的价值判断比较困难。面对这样的社会，政府应该积极调整社会的惰性因素，但日本政府很明显在这方面做得不够，这也就是安倍之所以能够得到一些民众支持的原因，他给大家的感觉是可以改变日本长期以来没有改变的东西，这让大家有盼头。

庚欣：关于中日韩自贸协定问题。日本现在面临着几方面的区域经济整合机会，说明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急需进行区域整合，这不仅来源于地区内部发展的要求，而且是全球一体化和经济地区化的要求。中日韩自贸

协定是 TPP 的一部分。TPP 现在谈判进展困难，说明日本心里惦记着中日韩的谈判，认为中日韩间的实际利益比较多，谈成的可能性比较大，特别是中国现在发展潜力这么大，和中国互补效应又这么明显，所以我认为中日韩自贸协定一定会往前推进。

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对日本经济的评估大家讲的基本是对的，只是评估的深度还不够。给大家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在经济陨落的情况下依然对中国还这么强硬？这背后的原因我们现在了解的还不是非常透彻。我们老讲中国可以反制日本，但用什么手段反制日本？中国能把日本打趴下吗？若不用战争有没有其他可能性？问了一圈专家，还是没有明确答案。

即使这样，我认为日本还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的一个试金石。日本这么小的国家，为何在短短几十年之内打败了那么多的大国？日本自己很骄傲，说自己是亚洲唯一一个和各个大国全都打过仗，而且都取胜的国家。过去我们谈日本提得最多的是科技兴国、国民精神、善于学习，现在恐怕光谈这些还不够，对日本崛起的真正原因研究得还不够透彻。日本为什么之前能这么强大，突然又在二三十年间就衰落了昵？同样是一代日本人。今天我得到了很多的启发，又产生了新的困惑，这个困惑恰恰是我们这批搞智库的人需要去研究的。